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罪与罚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朱宪生 曾思艺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罪与罚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朱宪生 曾思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朱宪生,曾思艺译.
—合肥:黄山书社,2014.11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
ISBN 978-7-5461-4810-6

I. ①罪… II. ①陀… ②朱… ③曾…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072号

罪与罚
ZUIYUFA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朱宪生 曾思艺 译

出品人 任耕耘
总策划 王亚非
执行策划 任耕耘 杨雯
编辑统筹 马磊 金浩
责任编辑 高杨 张月阳 王舒彦
责任校对 卓篁
装帧设计 齐娜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550千
印张 33.5
书号 ISBN 978-7-5461-4810-6
定价 60.00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0551-63533725

经典的力量 一生的滋养

王亚非

今天的精英，当年读什么？

读的是热血，读的是精神，读的是民族，读的是修养。

个人需要梦想，民族需要阅读，国家需要富强，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辉煌。

缺失梦想，个人将浑浑噩噩；丧失阅读，民族将缺乏精神。

有梦想必有情怀，我们的情怀是国家繁荣、民族振兴、一代一代人的幸福与崛起。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构筑往往来自经典文学作品承载的人性光辉和价值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血梦想和青春记忆，青年时代的文学情怀往往影响我们一生，滋养出辽阔的精神世界，甚至决定着人生的方向。

经典是什么？经典是书中之书，有哲理，有梦想，有力量，有情怀。哪一个人年轻时，不是“文青”；哪一个人年轻时，没有读过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便在今天，经典仍然是种精神的催化剂，是热血之源。一代一代都需要热血，因为血总是热的，热血沸腾才会有热度、有事业、有创造。我们这一代，今天的新一代，同样都生活在滚烫的时代，拼搏着滚烫的事业，都有一颗滚烫的心。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代人，生在红旗下，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动荡，赶上了恢复高考，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现在很多都成为国家栋梁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引领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峥嵘岁月，他们历经沧桑而壮志不改，梦想炽热。这与他们青年时代的阅读和追求密不可分。

俄罗斯文学经典曾经是中国那一代人年轻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从《战争与和平》到《铁流》，从《安娜·卡列尼娜》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深深吸引着一颗颗年轻而燃烧的心。其中塑造的很多人物形象，成为这些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内蕴的情感涵养了他们的文化情怀和生活品位；承载的价值理念，内化成他们毕生坚守和追求的人生理想。他们曾经最热血的梦想是像夏伯阳那样跃马挥刀，驰骋疆场；最美的青春记忆永远是手风琴伴奏下喀秋莎的动人旋律和旋转裙裾。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有尊严的人生所需要的文学滋养。

那一代人，几乎走过一样的路。那真是一段梦想质朴、青春热血的黄金岁月，一代人的阅读、一代文学青年的丰盈精神，成就这个大时代里最蓬勃的社会推动力，源头正是那些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闪耀着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光辉。

2014年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习近平第一印象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这部小说就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的。对于俄罗斯文学，习近平在专访中还提到了很多俄语作家的名字：“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俄罗斯文学。他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欢《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文学经典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感召力？或许因为其壮阔的时代背景，激昂向上的民族精神；抑或源于其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默默奉献的人性光辉。

中国与俄罗斯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面积辽阔的大国，人民勤劳而富有奋斗精神，都有反抗法西斯侵略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曾经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民族之间容易引起共鸣。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经典？

重温经典，感受那波澜壮阔岁月里涌动的高尚的人文情怀和朴素的情感，提高自身文学修养。读什么书决定你走什么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的基础是年轻时代的文学修养决定的。没有文学情怀和积淀，就没有生活价值观，很多成功的人都有很深厚的文学修养。

汲取正能量，坚守梦想，实现自己人生的辉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不放弃远大的理想、纯洁的人品、坚定的信念，这种可贵的精神在苏俄经典文学里体现得非常充分。多读读这些书，才知道青年时代的黄金时光是多么美好而短暂，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才算有意义，从而不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和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希望能向当代的年轻人推荐自己一生难忘的十部俄罗斯文学经典，让迷惘而焦虑的你，在喧嚣的环境里，尽情阅读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小说，从中汲取生命的维生素，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难忘的情愫和感动。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精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和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叶·伊琳娜的《古丽雅的道路》等十册图书。内容主题多元，思想内涵丰富，翻译语言精准，非常值得大家好好读读。

总序：重温往日恋人的情书

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俄罗斯人自认为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一致的：就是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演讲时曾说：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针对俄罗斯的轻蔑、责难和声讨方才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他甚至把这个“转折点”精确地定位在1881年，即《安娜·卡列尼娜》的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和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等事件的集中发生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翻译家大会上，巴格诺院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唯一正面因素。”

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终于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座高峰，推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

得出手的国家名片。从此俄罗斯文化中也出现了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即文学不仅在各文化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厚的文学。在俄罗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则被奉为“生活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是所谓的“审美的乌托邦”，因之也就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俄罗斯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始终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和良心的声音。

在中国，文学读者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初通文墨的普通百姓对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也不陌生，说俄国文学在中国家喻户晓或许并非言过其实。鲁迅所言的“中俄文字之交”源远流长，第一篇汉译俄国作品《俄人寓言》于1872年在上海见报，被收入本套丛书的《上尉的女儿》（又译《大尉的女儿》）则是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俄国小说，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为1903年。历时百余年的中国俄罗斯文学接受史，对于中国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

要影响。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一同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宣传者，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巴金等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推广人。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更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形成了所谓的“俄苏情结”。无数中国人迷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他们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歌，喜欢看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怀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当时，大量中国读者与苏联读者同步地阅读着每一部苏联文学新作，很多人甚至能用俄语阅读原著。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经历近二十年的停滞之后又迎来一个“井喷”时期，成千上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或新译或再版，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也烙上了俄罗斯文学风格的鲜明印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似有所下降，这既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处境和嬗变相关，也与我们自身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的转变相关。比如，当代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解构趋势，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浓厚的文体实验色彩，再者，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大传统中，当今的俄罗斯作家似乎更热衷于发扬光大后一种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还有待赢得中国读者的理解和呼应。但是，中国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十余年来，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年大约都有中译本二十余种，无论是俄罗斯当今文坛的老作家如拉斯普京、马卡宁等，还是文坛新人如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甚至俄罗斯“处女作奖”的获奖者们；

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如佩列文、索罗金等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纷纷赢得了与中国文学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关注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追踪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心中是有一幅清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全景图的。

然而，我们常常听到读者说，当代俄罗斯文学读来远不如之前的俄苏文学那么亲切。任何文学阅读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阅读语境又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氛围、文学潮流和美学时尚以及阅读者的年龄和经历等多种因素。心怀旧情面对新对象，或将新潮的心态诉诸老去的人与事，往往难免隔阂。但以怀旧的心境打开尘封的往事，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又合理的举动。黄山书社此次推出这套“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在藏典的书柜里挑出几册旧书，新瓶老酒，仿佛能让人闻见岁月酿造出的醇香。如若说，面对新译的俄罗斯当代作品，我们就像在手机屏幕上浏览新识朋友的微信，那么，翻阅这里的十本新印旧书，我们则像在夜半台灯下捧读往日恋人的情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

2014年8月18日于京西近山居

俄罗斯心理小说的杰作

俄国伟大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一八四三年毕业于彼得堡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早在中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和俄国以外的文学名著，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司各特、席勒等人的代表作品更是为他所爱不释手。在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他不仅继续大量阅读俄国以外的文学名著，对果戈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自己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两部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鲍里斯·戈杜诺夫》。毕业后，他正式进行文学创作。一八四六年，他发表书信体小说《穷人》，受到诗人涅克拉索夫和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一举成名，在文学界引起了注意。后因参加俄国最早的进步知识分子革命组织——彼特拉舍夫斯基（1821—1866）小组，于一八四九年被沙俄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几分钟获得沙皇的赦免，改为流放——先是在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服苦役四年（1850—1854），接着被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当了五年列兵（1854—1859），一八五九年十二月，获准回到彼得堡。回彼得堡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办报刊和文学创作之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创作成果颇丰，重要作品有：《穷人》（1846）、《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861）、《死屋手记》（1862）、《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1）、《少年》（1876）、《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作家日记》（1873—1881）。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作家完全走向独创性的一个成熟的标志。从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对之进行考察，可以说，这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作家多年酝酿、苦心经营的艺术结晶。早在一八五九年十月九日写给其兄长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宣称，打算创作

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而且相当自信地认为：“这部忏悔录将会确立我的名声。”一八六〇年底，在阅读法国的刑事案件汇编时，其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1800—1836）诉讼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触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准备从事法律研究的青年，为了抢钱，杀死了一个老太婆，被捕后他在狱中创作了一些诗歌，并写了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解，宣称自己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与社会的不公正做斗争的勇士，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普遍的不公道复仇，结果变成了“社会的牺牲者”。一八六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当代》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案件的审判记录汇编，并且亲自写了按语：“在这件诉讼案中，涉及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感到可怕而有趣的人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竟把自己说成是自己时代的牺牲品。”并且认为它“比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还要吸引人，因为这类诉讼案照出人的灵魂的黑暗面，艺术是不喜欢触及这些黑暗面的，假如触及了，也只是用插曲的形式顺便一提……”于是，他结合自己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这一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虚构，让这个故事发生在俄国的首都彼得堡，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在一八六六年最终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于十六至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经相当成熟和繁荣。综观这几百年间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它经历了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情节小说是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刚刚产生时期的一种形态，由于它受到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和中世纪骑士传奇等的影响，更注重描写离奇的情节和一系列变化多端的事件，情节是压倒一切的，甚至主宰着人物的性格，而且叙述的是异乎寻常、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人和事，人物性格则往往是简单的、概念化的，一出场就已定型，其代表作品是法国拉伯雷（1494？—1553）的《巨人传》（1532—1564）、西班牙塞万提斯（1547—1616）的骑士小说《堂吉珂德》（1605—1616）。

十七世纪以后的小说，逐渐转变为人物小说——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的代表作《克莱芙王妃》（1678）首开纪录，到十八世纪这类小说趋于成熟。人物小说不再过多关注异乎寻常的带幻想色彩的人和事，而把普通的甚至是平庸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让主人公的活动与性格起主导作用，情节则成为人物逼真的活动背景相场所，人物是独立的、有血有肉

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同时人物与情节开始融合起来。不过，异乎寻常的是具有惊险色彩的事件仍有一定的市场（十八世纪后期的哥特小说尤其如此，十九世纪西欧不少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依旧还有这种痕迹）。人物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法国勒萨日（1668—1747）的《吉尔·布拉斯》（1715—1735）、英国笛福（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等。

心理小说虽然最早的当推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但到十八世纪末感伤主义心理小说才产生颇大的影响，到十九世纪后期才出现繁荣的局面。心理小说在人物小说追求逼真的情节与环境的基础上，更注重在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种种冲突中揭示人的内心情感与灵魂深处。它适当地简化了人物小说对环境与事件过分详尽、逼真的描写，而把笔墨主要集中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一种从外化到内化的转变，直接通向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

作为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

从文艺复兴至陀氏创作《罪与罚》时的欧洲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弘扬人的个性，歌颂个人为维护各个方面的权利（追求个人发展、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社会政治方面的平等和作为等等）而进行的各种斗争，揭露或控诉不平等的社会对有才华、有追求的个性的扼杀。

《罪与罚》则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它既肯定了个人追求自由、捍卫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又深刻地揭示了过分追求个性自由、个人权利从而发展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实质。这是对西方长篇小说在主题上的创新、推进与深化。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受西方思潮及拿破仑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于后来德国哲学家尼采“超人”哲学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芸芸众生人为地分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仅仅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干、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新见解的人。”后一类人不仅能提出新见解，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新见解，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杀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他哪怕踩着尸体，踏过血泊，那么，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良心上，依我看，是可能会允许自己踏过血泊的。”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挑选了一个放高利贷的穷凶极恶的老

太婆作为实验对象，并且又被迫杀死了正好发现他杀人的老太婆的妹妹——极其善良的莉扎薇塔。杀人后，他的良心使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又一时难以放弃自己那“非凡的人”的理论，千方百计试图逃避法律的惩罚。因此，小说的绝大部分细致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的灵魂在善与恶、罪与罚两极之间的苦苦挣扎与激烈斗争。

《罪与罚》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现实性、哲学性、宗教性三者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法国的一桩刑事案件，但作家有意识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俄国当代的犯罪故事，并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中心，广泛反映了俄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思考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人的出路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家境贫寒（仅靠老母亲那一年一百二十个卢布的养老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被迫辍学。他的妹妹杜涅奇卡为了支持哥哥读完大学，先是到地主斯维德里盖洛夫家担任家庭教师，饱受侮辱，继而被迫试图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极端自私自利者——颇为富裕且拟在彼得堡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市侩卢仁。主人公结识的退职九等文官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由于家长没有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三个幼小的孩子啼饥号寒，饥肠辘辘，大女儿索尼娅被迫当了妓女，以卖身的钱来养活弟妹。而主人公在街上碰到的被欺骗玩弄的年轻少女，以及他贫困的大学同学拉祖米欣，也无一不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贫穷。主人公正是深感人们的普遍不幸和贫困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形成了自己那把人按非凡与平凡两分的理论，并最终在多种现实环境力量的冲击下，去杀人以实践自己的理论。

然而如果仅此而止，那么这部小说与西欧小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这部小说的新颖与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贫困与无奈，更进一步以此为基点，从哲学与宗教的高度，思考了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

首先，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小说思考了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文化冲击，在俄国个人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便高扬起个性自由的旗帜，启蒙运动更是为这—个性自由莫立了全面而理想的哲学与社会政治基础。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却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这种个人主义已发展为一种极其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完全无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给他人和社会带来

了极大的灾难，甚至成为整个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之一。在西欧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也开始出现类似于西欧的情况（小说中的卢仁、拉斯科尔尼科夫即为显例）。那么，个人究竟该以何种方式与途径发展自己的个性呢？这就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俄国学者弗里德连杰尔指出：“小说家通过对个人的命运的分析把我们引导到有关过去与当代的全部文明的实质上来，而这种文明是建立在不平等和不公正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一个人想靠肉体 and 道义上的暴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意愿上的。”作家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抢钱以及犯罪后心灵深处激烈的善恶交战、最终的投案自首，彻底否定了他这种建立在西欧个人主义理论基础上的“非凡的人”的哲学（尽管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并非西欧观念的再版，如他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试图拯救穷苦大众的思想，他试图杀死一个百无一用而且危害人间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她一人的死换来成百上千人的生，详见第一章第六节），从而认为个人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自私自利、无视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

进而，作家从宗教的高度开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处方。作家生动地写道，拉斯科尔尼科夫虽然有一种类似于“超人”哲学的理论，并且在现实多种因素的刺激下把它付诸行动，但他犯罪后良心不安，被他蔑视的道德规范暗暗地惩罚着他的灵魂。他噩梦连连，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几次打算到警察分局去投案自首。这样，这部小说所写的真正惩罚就是道德与良心的惩罚，它所描绘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道德和心理斗争。弗里德连杰尔精辟地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主人公所犯下的罪行不仅触犯了社会法律，而且首先是触犯了那条最高的法律。这条法律的体现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人民群众。这条法律已由永恒的不可磨灭的符号写在主人公的心上。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时候，正如我们知道的，犯下了双重罪行：不仅杀死了她，而且也杀死了‘自我’，用‘剪刀’剪断了自己与周围人们及全人类的联系。拉斯科尔尼科夫犯下了双重罪行，所以也为之受双重的惩罚——刑事法律的惩罚和刻在他个人心上的道德法律的惩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起诉人不是侦查员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而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主人公与包含在他自身的，即他良心上的道德法律的斗争决定了小说的情节和结构。”

个人的出路，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一直是作家关注的中心问题。早在一八六〇年九月，他就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

后来被称为“土壤派”(又译“根基派”、“根基主义”)^①宣言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它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于自己的“土壤”(或“根基”)——人民精神和人民大众。“我们本来活动的特点应该真正是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也许会把欧洲各个民族以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融合起来,那些思想中一切敌对的因素也许会同俄罗斯民族性协调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因为俄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笃信宗教,温顺谦恭,逆来顺受,富有博爱精神,具有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道德的表率。可在俄国历史上,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只有过一次结合,那就是一八一二年的抗法卫国战争。当前,在西方思潮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一起推行各阶级和睦相处的宗法制田园生活,这既与欧洲先进的社会思想相接,又植根于俄国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在《罪与罚》中,作家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等的形象,把自己声明中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了。

在小说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由于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然而在索尼娅的影响下,他终于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并在宗教中找到了新生。索尼娅是作家塑造的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实际上是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美好代表:她虔信宗教,温顺柔和,逆来顺受,而且具有突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博爱的化身。她的继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曾当众指出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广的爱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她为了济人之难会脱下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光着脚去把它卖掉,再把钱送给你们。”她为了继母的三个孩子,不惜做出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莫此为甚的自我牺牲——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钱养活他们。正是在索尼娅这种极强的忍耐和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拉斯科尔尼科夫曾

① 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形成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和一种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斯特拉霍夫,对俄罗斯命运的关怀和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信念把他们结合起来。他们以陀氏兄弟创办的大型文学政治杂志《当代》(1861—1863)和《时代》(1864—1865)为中心和阵地,既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又反对“纯艺术派”的唯美主义理论,而认为俄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德信念的沦丧在于俄国教养的知识阶层长期脱离人民这一根基,出路在于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结合,吸取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根本因素——虔诚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和忠君思想,这样才能使俄国社会各阶层克服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信仰危机,重振俄国的经济文化,甚至为陷于道德精神危机的西欧社会指明新的出路。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体现的是人和人类思想,即基督精神,它永远能促进社会的道德进步和个人的道德完善,永远是人民的和民主的艺术,而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最完美的体现者,他的艺术天才无可争议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对于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的追求。

为此向她下跪)及其虔诚信仰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抛弃了西欧思想的影响,而回归到俄国人民与宗教之中,并且与索尼娅相爱了。这就是作家为俄国探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开出的药方——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信仰宗教,信奉人民的道德,温顺谦恭,胸怀深广的爱,具有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上可见,作家的确在主题思想方面颇有创新,并且大大推进、深化和丰富了欧洲小说的主题。与此同时,这一主题又具有极其浓厚的俄罗斯特色。

俄罗斯文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关注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反映并思考这一问题,同时又与道德尤其是宗教的内容、与对人性的探索结合起来,因而又具有了超越性——由当前的现实功利性上升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既具当前现实功利性又相当具有人类性的极其难得的文学。它面向现实,但又颇具超越性;它关注彼岸,但又把根子深深地扎入俄罗斯劳苦群众的土壤。因此,这一文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强烈的民族激情。它具体表现为关心俄罗斯民族与俄国的前途与命运。这一点,仅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体系——“多余人”^①、“新人”^②、“忏悔的贵族”^③等等——上即可一目了然,他们无一不表现了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对俄国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罪与罚》根植于这一传统之中,但又有新的突破——“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关注的是占少数的上层贵族的命运,“新人”虽有突破,但毕竟只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平民知识分子。陀氏的主人公则是普普通通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他们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后是绝大多数,更具有普遍性,他们的命运与出路直接关涉俄国的命运与前途。

作家满腔热情地对此加以关注,更是体现了他那相当强烈的民族激情(从前述作家写的声明中已可略见一斑)。可以说,正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

① 俄国19世纪中期文学中的一系列优秀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聪明,有良好的教养,在社会政治方面,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站在人民一边,在文化方面,则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冲撞中无所适从,因此,对平庸的生活不满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忧郁、苦闷、悲观,最终变成一事无成的“多余人”。主要代表有: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勃洛莫夫。

② 俄国19世纪50至6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也包括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他们热爱自由,尊重劳动,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信任和支持,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即追求个人的幸福不应损害他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要与祖国和人民的幸福统一起来。描写这一形象的作品主要有: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③ 俄国19世纪后期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受过良好教育,有强烈的道德感,一度犯过错误,后来幡然悔悟,深深忏悔,并用实际行动来赎罪,主要见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